

我为什么反对“读经”

商友敬

一百年来，以“弘扬国粹”为理由而鼓吹“读经”的呼声，似乎没有断过。算起来有五六代人了。只有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，大家都识时务，不敢提，因为举国都在嗷诵别一种“经”。

“文革”才结束，鼓吹“读经”之声又起，而且海内外、海峡两岸遥相呼应，有办班的，有筹建书院的，有广为印制发行的，甚至还有“国际交流”的，似乎成了一种气候，但效果却不见显著，因为大家都读不懂。

本来，读也好，不读也好，各有自由。你宵鼓吹的自由，我有反对的自由：你有“弘扬国粹”的理由，我也有“救救孩子”的理由。

先来说说“读经”的过去：孔子的时代是怎么教书的？不清楚，但在《论语》里大致可以看到，是谈话法，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差不多，有时师生之间还互相辩难，这就留下许多名言隽语，记载在《论语》里。这些话好不好？今日看来有极好的，有一般好的，有可看可不看的，也有大可不必一看的。以后呢，随着孔子在历代王朝地位的升迁，他的话不管你懂不懂，不管你认为好不好，都要读都要背。光读、背《论语》还不够，再加上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里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，合称“四书”，由南宋的朱熹集各家注解，编为《四书集注》，成为元明清三代最基本的教材。非但要读，还要背；非但背正文，还要背注解——因为要考。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题目就是“四书”里的一句话，然后考生用“四书”里的话语写成“八股文”，叫做“代圣人立言”。这样可以造成几个后果：一是学生的思想都被“四书”罩住了，用现在的话说是“思想不解放”。二是学生只会用“圣人”的口气说话，别的话不敢说，久而久之也就不能说了；三是在这个脑袋瓜子上可以戴一顶官帽，用这种口气可以打打官腔。其余的本事呢？一概没有。用清代名医徐灵胎《道情》上的话来说是：“辜

负光阴，白白昏迷一世。就教他骗得高官，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。”（《时文叹》）——所以才有 19 世纪末的“废科举”、“废八股”，同时也就有“废读经”的呼声和行动，接下来“兴学堂”，“编新式教材”，使中国的教育走上一条新的道路，用现存的话说就是“与国际接轨”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北师大的郑国民博士有一本专著《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——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》，说得很中肯，也很详尽。我认为，20 世纪以来，中国的教育尽管有坎坷，有失误，有迷茫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总比“读经”好。

但是不是就把古代的经典都废了呢？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它毕竟是古代重要的历史文、思想资料、精神资源，有的还是优美的文学作品，关键的问题在一点：不要把它当“经”读。

什么是把它当“经”读呢？你只要看寺院的和尚是怎么念经的，教堂里的信徒是怎么念经的，三十几岁以上的朋友一定记得“文革”时是怎么“天天读”、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的。用林彪的话说，“一句顶一万句，句句是真理”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在执行中理解”。——它们在精神、态度和方法上是一致、这就是“跪着读”：屈膝，表示崇拜；低头，表示屈服；口中念念有词，表示信仰；脑子动也不动，表示毫无怀疑，全盘接受。

你如果认为这样做可以成为一个“好人”，我是杀了头也不能相信的，这样做的人只能成为一个愚昧的人、麻木的人，或者是个伪善的人。

“五四”的精神，就是启蒙的精神，让我们的国人从“跪着”的状态中站起来，学校里的学生再也不能以“读经”的态度来读课本，我们该“站着读”了。

“站着读”的书，不管是什么，都不是“经”而是“文”，清代学者章学诚有句名言：“六经皆史”，他把据说是孔子整理的教科书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

《春秋》等，都看作是“史”，历史的资料。这才是科学的态度，客观的态度：我们今天看待“六经”或者“四书”以及一切古代文化典籍，也都可以这样看，而从我们教师的角度来看，也只是一些可供挑选的“传统教材”。所以你可以选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的片断，可以选《礼记》、《诗经》中的某些章节来教学生，使他明白古代人的生活是怎样的，古代人的思想是怎样的，古代人说话是怎样的，记得好的可以记住，并化为自己的语言；有兴趣的，自己还可以找书看，多阅读一些，也可以扩大见识增加修养；认为是真理的也行，蓼不相信的也行，以后阅历多了，意见改变，过去相信的不信了，过去不信的又相信了，也行。——总而言之，是用自己的脑子来衡量，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。这就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读书态度与方法。因而，这就不“读经”。

今天，我反对办“书院”，反对读古代儒家“经典”，还有两点具体的理由：一是：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没有办法读。先说“五经”。《诗经》里面有几篇好懂的，往往都已选入大中学校的教材里，作为古代的民歌和诗篇供学生阅读欣赏了；《易经》是占卜的书，除了有人将其中“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”之类的话用作“格言”、“校训”之外，别的也没必要再去光顾它了；“三礼”、烦琐至极，一点也没有用；《尚书》，连韩愈都说它“佶屈聱牙”，比“绕口令”还要难读，而且比“绕口令”还要无用，不是专门研究古代历史的，是绝对用不着读它的；最后剩下《春秋》，古人已讥之为“断烂朝报”，相当于今日报纸的“大标题”，有什么读头？只有《左传》里的几篇，也选人教材，如《曹刿论战》等等，不过数篇而已。——总之，“五经”不必读，也不可读。

“四书”呢？稍微好一些。《论语》可以选读其中的一部分，从中可以看到老夫子的事迹、意见和为人，他是个“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”的老师，但绝对不是“句句是真理”的通天教谕，有时不免强词夺理，但有一股“气势”，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发言说话和写文章。《大

学》是“修身”的教材，讲道理太简单，用一根“因果的链条”把一切都串在一起，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：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身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……”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？令人难以置信。《中庸》就更难懂也难行了，如不是专门的研究者，不可能鬻卖它。

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不好读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读后人编的“蒙学读本”吧，那就不能算是。“读经”了，但今日流行的正是这些。“蒙学读本”有两个问题，一是极迂腐极庸俗，二是违反科学甚至违反常识。我们随便翻翻那些流传最广的东西：

“运去金成铁，时来铁似金。读书须用意，一字值千金。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……”（《增广贤文》）

“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。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，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。日月五星，谓之七政天地与人，谓之三才。日为众阳之宗，月乃太阴之象。虹名……，乃天地之淫气；月里蟾蜍，是月魄之精光。……”（《幼学琼林》）

“四字女经，教尔聪明。娘边做女，莫出闺门。行莫乱步，坐莫摇身。笑莫露齿，话莫高声。轻言细语，缓步游行。梳妆伶俐，洗浆浴尘。红粉不傅，肌肤自清。……”（《闺门女儿经》）

“天子重英豪，文字教尔曹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，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学从勤中得，萤窗万卷书。三冬今足用，谁笑腹中虚。自小多才学，平生志气高。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。……”（《神童诗》）

这些“蒙学读本”一翻开，就臭气熏天，我不知道今天提倡读这些“经典”，印这些“经典”的人是何居心，是什么用意，孔夫子活过来也会气死。

所以说，一、“经”不可读；二、所读非“经”。今日提倡“读经”者，绝对是误人子弟。1935年，傅斯年写过一篇《论学校读经》的文章，其中说道：“当年的经学，大部分是用作门面装点的，词章家猎其典故，策论家壮其排场，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。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缺点虽极多，而真心用经文以‘正心诚意’的，可就少了。这本也难怪，经文难懂，又不切合后代生活……若明白这事实，便当了然读经的效用，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。

“我不知今之主张读经者，为的是充实国文或是充实道德力量？如欲以读经充实国文，是最费力不讨好的；如欲以之充实道德力量，哲学。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。

“今日学校读经，无异拿些教师自己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给学生。若是教师自己说实话，‘不懂’，或说‘尚无人真正懂得’，诚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；若自欺欺人，强作解事，无论根据汉儒宋儒或杜撰，岂不是以学校为行诈之练习所，以读经为售欺之妙法门？”

“读经”的最可恶之处是教人“先崇信，后理解”。甚至不必理解，盲目崇信。也就是把人当成“礼教”的工具，丧失了人的独立性和人格。六十八年前，傅斯年先生把话都说透了，想不到时至今日，还有人要来提倡“读经”，真不能不使人惊叹：反封建、反专制、反礼教的任务，我们远未完成；而启蒙的工作还需继续不断地努力。没有“独立之人格，自由之思想”的人，是谈不上什么“现代化”的，更谈不上成为“世界之公民”。